2018年第3期
（第17卷）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农民工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

欧阳博强[1]，张广胜[2]

（1.沈阳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866；2.辽宁大学 商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摘　要：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研究了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60%的农民工从事雇员类工作；暂时性失业或返农农民工的比例达15.53%；自我雇佣类农民工占比为25.06%；男性农民工处于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受教育水平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是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决定因素；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域的农民工进入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可能性更大；农民工的年龄与其职业层之间呈倒“U”型关系；影响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因素会因代际、收入水平以及居住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分化；职业层分级；非农就业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8)03-0048-14

一、农民工就业及其分化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被视为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中国奇迹”[1]。除了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外，人口红利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另一重要驱动力量，贡献了经济增长的25%[2]。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大量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报酬递减假设[3]，同时触发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4-5]。可见，农民工就业是释放中国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窗口，对经济增长的意义重大。截止2016年底，中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8171万人，占城镇就业劳动力的67.5%。然而，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尽管农民工就业的占比很高，但缺少系统的就业与失业管理，难以对农民工就业所遇到的问题作出全面、细致的分析。随着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以技工红利替代旧的廉价劳动力红利已是大势所趋[6]。劳动力红利由“数量型”向“技能型”的转变无疑会对农民工的就业造成冲击，然而在中国全面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如果不能稳定就业，则不具备市民化的经济基础。

中国农民工的就业一直伴随着持续性分化现象。自改革开放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村经济改革制度以来，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农民利用农业闲暇时间陆续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到就近乡镇从事短期性非农工作，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了由纯粹农民演变为农民工的职业身份转型。自此，农民工开始了以兼顾农业生产和短期性非农生产为特征的就业分化①模

收稿日期：2017-11-01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8.03.0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273179)；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支持计划(WT2015009)；辽宁省特聘教授支持计划(2013-49)

作者简介：欧阳博强(1989—)，男，湖南郴州人，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344194903@qq.com

①一般而言，劳动者由于受自身因素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会在不同就业部门或不同职业领域或以不同的身份提供劳动供给而形成多种就业状态。通常认为，失业和就业是对立的，但若以劳动时间来衡量就业程度，则农民工绝对的失业状态(劳动时间等于零)几乎不存在，即便是家庭主妇，其操劳家务、扶持家庭等也提供了劳动时间，因此失业这种“劳动供给”状态也可视作就业分化形式中的一种。

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消除了农民工的流动障碍，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区域由就近乡镇逐步向远方城市扩展，流动形式也由“离土不离乡”向“离土又离乡”转变，逐渐形成了以短期兼业、长期非农就业为主的就业分化状态。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从事非农工作的职业技能水平不断提升，在城市工作的职业类型日益丰富，形成了遍布非农领域各类职业的就业分化状态。农民工在非农领域的就业分化不仅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也是城乡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要求[7]。目前，中国经济基本进入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新常态”，而经济增速的放缓势必会影响农民工的就业分化演变[8]，因此农民工的就业分化问题亟需进入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视野。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拟从职业层①的层面考察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关注的问题是，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具有什么特征？影响农民工就业分化的因素有哪些？谁晋级高层级工作岗位？影响农民工职业层晋级②的因素是否会因代际不同、收入水平不同以及居住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拟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建立相关计量模型进行分析，以期考察农民工的就业分化情况以及不同特征农民工群体职业层晋级的约束，为引导农民工职业层的合理流动提供决策依据。

二、农民工就业分化的理论评述

整体而言，目前针对农民工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乡城转移的就业选择[9-10]，农民工的就业流动[11]及其成本与收益[12]，以及农民工的就业歧视[13-14]和就业保障[15-16]等方面。相比之下，围绕农民工就业分化主题进行的研究文献较少。总体上，农民工就业分化的研究伴随着以下3类文献由浅入深地演进：

第一类文献涉及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在某种意义上，职业选择就意味着就业分化的开始演变，职业选择可视为农民工就业分化的前提，所以说这类文献与农民工就业分化不无关系，但这类文献不是直接分析农民工的就业分化情况。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人力资本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17-18]。然而，在二元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多被配置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其人力资本等因素决定的职业选择型态是有限的，不能全面反映出农民工就业分化的整体情况。换而言之，尽管农民工的就业分化源于职业选择，但职业选择只是农民工就业分化演变过程的一个部分，不能代表就业分化。

第二类文献考察了农民工就业分化的影响因素。这类文献利用相关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的就业分化状态及其影响因素。首先，对于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就业分化，Basker[19]利用1981—2001年的人口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相对于辍学农民工而言，具有高中文化农民工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要大0.82；Ariga等[20]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随着农民工就业的持续性分化，农民工的就业分化不仅仅局限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就业分化也在相关文献中得到扩展。王建[21]基于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认为，在非农就业分化上，技能培训所发挥的作用高于正规教育；谢勇、周润希[8]在研究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分化问题时进一步发现，随着受教育水平、个人能力的提高，返乡农民工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状态的概率显著上升；纪韶、刘德建[22]以北京市为例

① 严格意义上，职业没有好坏之分，但不同职业类别由于工作内容、收入水平、社会地位以及创造性和成就感的差异而具有高、低之别的层次属性。本文将农民工的职业层由低到高区别为5个等级，失业和务农为最底层，帮工类为底层，无固定雇主类为下层，有固定雇主类为中层，工商个体和创业者为上层。

② 就业分化通常伴随职业层的演变，本文将农民工的职业层由较低层级向较高层级演变视为职业层晋级。

的研究还发现,男性、已婚、工作经验丰富的农民工从事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可能性更大,且家庭支持对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存在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个人能力、工作经验及家庭因素等对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类文献进一步分析了农民工的职业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就业作为劳动者的经济行为,需要通过具体的职业得以体现,而职业具有层次属性,因此就业分化的具体表现就是职业层分化①,即就业分化的最终状态是劳动者分化在不同的职业层就业。谭银清等[23]基于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约束下农民工的就业职业具有明显的低层次性;刘晴[24]认为行业福利差距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促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层次性趋势;陈书伟[25]基于河南省三县市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外出农民工的职业层次具有显著影响;杨晓军和陈浩[26]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民工从事高技能型职业的可能性更大;韩雪和张广胜[27]基于辽宁省三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越高的农民工,其所处的职业层越高;王铁和王琦[28]利用特大城市调查数据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越高,农民工所从事职业的高层次性越明显。这些研究比较一致地发现,人力资本会对农民工的职业层产生重要影响。

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对农民工的就业分化问题进行了比较有价值的探索,但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值得改进的方面正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

第一,从就业分化视角研究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文献相对比较单薄,相关文献侧重于分析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整体状况及其约束,且多停留在简单的描述性分析。而一个不可被忽视的事实是,农民工的就业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分化现象,他们多以雇员身份就业,同时也可能处于自我雇佣甚至暂时性失业、务农的就业状态,且就业分化的具体表现是职业层的分化,农民工最终分化在不同层级的工作岗位。因此本文建立计量模型,从职业层的层面考察农民工的就业分化,探讨影响农民工晋级高层级工作岗位的决定因素,以针对农民工就业分化的实证研究对相关文献加以补充。

第二,虽然部分研究对农民工的职业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但忽略了农民工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内部异质性特征。另外,农民工所处的职业层也并不是始终保持不变,换言之,就业分化很可能是发生过职业层晋级后的分化状态。而对于不同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其职业层晋级的影响因素可能不同,即影响他们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因素可能有所区别。因此本文进一步按照代际、收入水平和居住区域分组,考察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影响因素是否因代际不同、收入水平不同以及居住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这是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

第三,已有研究多是基于对几个省、市的调研数据分析农民工的就业分化问题,数据的代表性略显不足,不利于全面掌握农民工就业分化的总体情况。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该项调查共覆盖了全国28个省、自治区中100个县(区)的480个村(居委会),数据代表性优势比较明显。

三、农民工就业分化的现状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库。CGSS对社会、社区、家庭以及个人进行多层抽样调查,是目前综合反映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最早调查项目,其数据涵盖

① 劳动者由于个体特征差异或者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被分割在不同职业层就业的状态。职业层分化是就业分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在本文中,农民工的职业层分化被认为是其被分割在文中所界定的5个职业层(最底层、底层、下层、中层和上层)就业的状态。

全国100个县（区）、480个村（居委会）的12000多个样本特征。为得到本文研究所需的数据，只保留具有农业户口和非农就业特征（包括目前从事非农工作、以前从事非农工作但暂时失业、以前从事非农工作但暂时务农）的样本，在剔除变量缺失值的样本后，得到2067个有效样本。

表1显示了有效样本的基本特征分布情况，从中可知，男性农民工占比61.73%，男、女样本比例约为6∶4；36～45岁的农民工占比最高，约为30%，总体以中年农民工为主；已婚农民工占比82.29%；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工占比达到71.56%，学历水平整体较低；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整体较好，社会交往比较密切，但积极情绪①和普通话水平比较一般。从居住区域构成来看，农民工多居住在农村，其次是本市/县城的中心地区，只有8.22%的农民工居住在本市/县城区以外的镇。经济条件方面，家庭经济状况处于平均水平的占60.43%，但低于平均水平的也占32.75%；个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占比超过60%。

表1　样本特征分布情况

指标	组别	比例/%	指标	组别	比例/%
性别	女性	38.27	积极情绪	不积极	34.25
	男性	61.73		一般	58.35
年龄	≤25岁	13.06		积极	7.40
	26～35岁	24.29	普通话水平	差	24.19
	36～45岁	29.37		一般	39.43
	46～55岁	18.67		好	36.38
	≥56岁	14.61	居住区域	农村	42.91
婚姻状况	未婚	17.71		本市/县城的边缘地区	12.15
	已婚	82.29		本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	10.21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7.00		本市/县城的中心地区	26.51
	初中	44.56		本市/县城区以外的镇	8.22
	高中	14.71	家庭经济状况	低于平均水平	32.75
	专科	10.92		平均水平	60.43
	专科以上	2.81		高于平均水平	6.82
健康状况	一般及以下	23.13	个人收入水平	较低	38.95
	良好	76.87		较高	61.05
社会交往	不密切	13.45			
	一般	34.01			
	密切	52.54			

注：受教育程度中将“未上过学”和“小学”合并，“专科以上”表示接受过大学成人自考教育；社会交往是指与包括老家和居住地的亲人、朋友的联系密切程度；积极情绪是农民工对情绪积极性程度的自我评价，与问卷中的情绪抑郁程度逆向对应；居住区域指标以农民工当前所在居住地分组；家庭经济状况通过与所在地平均水平的主观比较得到；个人收入水平指个人全年劳动收入，其分组以《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公布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水平（2290元）为划分标准。

（二）农民工就业分化的典型事实

在CGSS（2013）调查问卷中，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包括失业、务农、家庭帮工、企业帮工、劳务工和劳务派遣人员、无固定雇主的受雇者、有固定雇主的受雇者、个体工商户以及自己是老板或合伙

① 积极情绪是心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对个体的求职行为产生显著影响[29]，因此本文认为这一因素将影响农民工就业或工作岗位的获得。

人等9类。将失业和务农的农民工合并为暂时性失业/务农组(此类农民工获取下一份非农工作或者再次从事非农工作的可能性极大,失业或者务农只是暂时的),将家庭帮工和企业帮工合并为家庭/企业帮工组,并利用所得样本数据描述农民工就业分化的现状。

1.农民工的就业分化情况

从农民工的就业分化情况(图1)来看,受雇于他人且有固定雇主的农民工占比最高,其次是个体工商户,劳务工/劳务派遣人员的占比最低。其中,受雇于他人的农民工总占比接近60%,自我雇佣的农民工总占比为25.06%,但处于暂时性失业/务农的农民工也有15.53%,这一比例的合理性值得关注。一般而言,农民工之所以会暂时失业、务农,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处于两份工作变换的间隔期,此时他们正寻找下一份非农工作或暂时帮助老家务农作为过渡;二是农民工处于返乡待业状态,特别是在当前农村扶持政策较好的背景下,农民工多愿意在离家乡较近的区域工作,或者自主创业,而在真正转入下一份工作之前,他们会处于待业状态或以务农作为缓冲。随着城乡社会的日趋一体化发展,农民工的返乡就业趋势也日益明显。多数研究表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返乡就业的农民工比例一般在25%~35%,如泰国农民工的返乡就业比例为26%,越南为31%,坦桑尼亚的Kagera地区为17%[30-32]。谢勇[8]利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农民工返乡就业比例达到35.88%,这一结果同以往研究所得结论一致,但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随着近年来中国农民工"返乡潮"的出现,农民工暂时性失业、务农的比例可能大大提高,因此本文计算所得的暂时性失业/务农的农民工比例具有一定的依据和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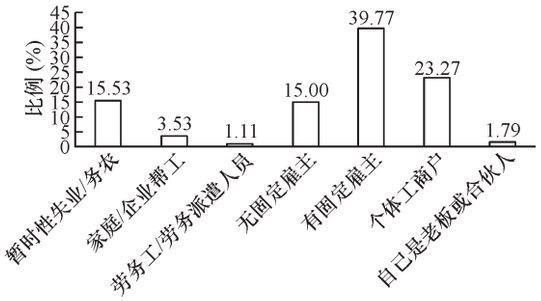


图1 农民工的就业分布

2.不同分化状态下农民工的主要特征

表2描述了不同分化状态下农民工的主要特征(将家庭/企业帮工、劳务工、无固定雇主和有固定雇主的劳动者合并为被雇佣组,将个体工商户、自己是老板或合伙人合并为自我雇佣组)。从表2可知,在暂时性失业/务农组的男性农民工占比为53.58%,分别比被雇佣(63.51%)、自我雇佣(62.53%)组低9.93%和8.95%,但暂时性失业/务农组的女性农民工占比均高于其他两组;暂时性失业/务农组中大于56岁的农民工占比最高,被雇佣组和自我雇佣组中均是36~45岁的农民工占比最高,说明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可能返乡或越容易出现待业状态;暂时性失业/务农组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交往、积极情绪以及普通话水平均普遍低于其他两类,意味着健康状况较差、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交往不密切、情绪积极性较差或普通话水平较差的农民工外出就业的适应性较低;暂时性失业/务农的农民工多居住在农村,被雇佣、自我雇佣这两类农民工多居住在城镇。

3.不同特征分组农民工的就业分布比较

按照代际、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居住区域分组,比较不同特征分组农民工的就业分布情况(将劳务工、劳务派遣人员合并到无固定雇主的雇员类,将自己是老板或合伙人和个体工商户合并为自我雇佣类)。

从图2可知,80~90后农民工在有固定雇主类的分布比例最高;60~70后农民工在自我雇佣类的分布比例高于其他两个代际组;而60后以前的农民工多分布在暂时性失业/务农类,说明年长者更倾向于返乡创业或从事个体工商户。图3比较了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的就业分布情况,从中发现,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分布在暂时性失业/务农、家庭/企业帮工、无固定雇主的比例普

遍高于其他高学历组，而分布在有固定雇主、自我雇佣的比例低于其他高学历组。从图4可知，低收入农民工分布在暂时性失业/务农、无固定雇主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布比例分别比高收入组大16.68%和3.83%；而高收入农民工分布在有固定雇主、自我雇佣的比例高于低收入组。从图5可知，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工分布在暂时性失业/务农、无固定雇主这两类的比例比城镇组分别高4.38%和9.29%，但分布在有固定雇主、自我雇佣的比例均低于城镇组。

表2　不同就业状态下农民工的主要特征　单位：%

变量	定义	暂时性失业/务农		被雇佣		自我雇佣	
		1	0	1	0	1	0
性别	男=1，女=0	53.58	46.42	63.51	36.49	62.53	37.47
年龄							
≤25岁	是=1，否=0	14.95	85.05	15.70	84.30	5.10	94.90
26～35岁	是=1，否=0	18.38	81.62	24.78	75.22	26.88	73.12
36～45岁	是=1，否=0	15.58	84.42	29.56	70.44	37.88	62.12
46～55岁	是=1，否=0	14.95	85.05	18.80	81.20	20.77	79.23
≥56岁	是=1，否=0	36.14	63.86	11.16	88.84	9.37	90.63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0	76.95	23.05	80.80	19.20	62.53	37.47
健康状况	良好=1一般=0	62.93	37.07	79.36	20.64	79.63	20.37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是=1，否=0	36.45	63.55	18.33	81.67	22.61	77.39
初中	是=1，否=0	42.68	57.32	43.11	56.89	49.49	50.51
高中	是=1，否=0	10.28	89.72	14.34	85.66	18.53	81.47
专科及以上	是=1，否=0	10.59	89.41	16.32	83.68	9.37	90.63
社会交往	密切=1，一般=0	49.84	50.16	52.19	47.81	55.19	44.81
积极情绪	积极=1，一般=0	30.53	69.47	65.02	34.98	64.97	35.03
普通话水平	好=1，一般=0	29.28	70.72	38.49	61.51	35.64	64.36
居住区域	城镇=1，农村=0	48.60	51.40	55.94	44.06	65.58	34.42

注：对表1中的指标进行0、1赋值，将社会交往、积极情绪、普通话水平变量中一般及以下水平的样本合并为“一般”，将居住区域变量中除“农村”以外的其他4类合并为“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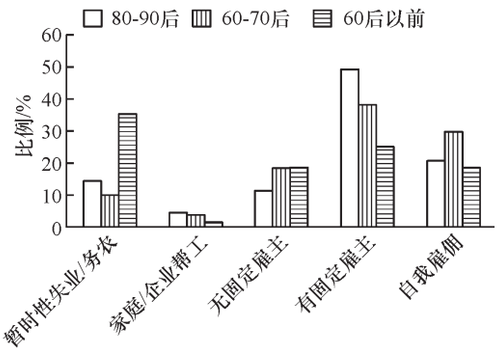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就业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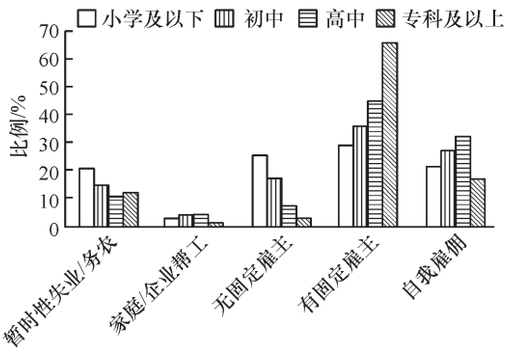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的就业分布

四、农民工就业分化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

根据职业理论的观点，职业类别具有某种层次属性，且经济档次及社会阶层演变会对从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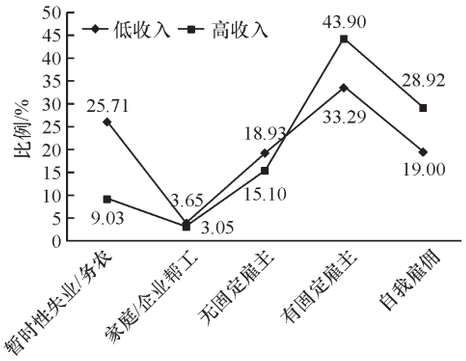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工的就业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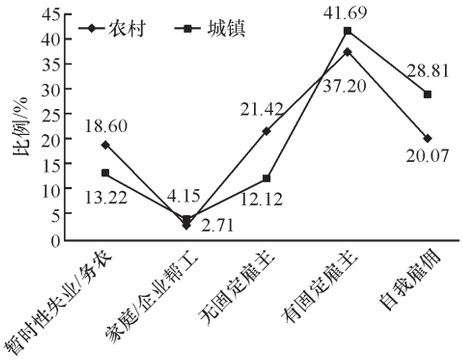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居住区域农民工的就业分布

的职业层具有显著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从业者就业方面的某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职业层次。而从业者是以获取不同类型职业的方式实现就业,因此职业层也反映出了从业者的就业特征,换而言之,从业人员就业分化的具体表现是职业类别或者职业层的分化。根据心理学家Anne Roe的亲职影响理论,职业系统按照难易程度和责任要求高低可划分为6个专业等级(高级专业及管理、一般专业及管理、半专业及管理、技术、半技术及非技术)和八大职业组群(服务、商业交易、行政、科技、户外活动、科学、文化和艺术娱乐)。针对农民群体,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33]将农民的职业层由低到高排序,划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与工商户、私营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与农村管理者8个类别。陈浩等[7]将失地农民的职业层由低到高分为农业劳动者和无业、短期雇工、长期雇工、技术人员和创业与管理者5个类别。基于研究目的,本文在借鉴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将农民工的就业类别由低到高分为5个层级:(1)最底层,暂时性失业、务农。这点与陈浩等的界定基本一致,另外将自由职业者并到该层级,主要考虑到这类农民工就业空白的几率较大,他们转向务农或者面临暂时性失业的可能性较大。此外,对于失业者而言,谈职业层次可能不太恰当,但若以劳动时间来衡量农民工的就业程度,则绝对的失业状态(劳动时间等于零)几乎不存在,因此这种"劳动供给"状态可以归结于最低的职业层次。(2)底层,帮工。包括在自家生意或者企业中帮忙的农民工,不管他们领工资抑或是不领工资,但都没有形成某种雇佣关系。相比于最底层,他们的就业模式发生了转变,从事的是非农工作,但和其他非农职业相比,他们从事的是最一线的工作。(3)下层,无固定雇主的雇工。包括零工、散工、劳务工和劳务派遣人员,较底层而言,他们和雇主之间存在一定的雇佣关系,然而这种雇佣关系不稳定,缺乏长期工作联系和远期保障。(4)中层,有固定雇主的雇工。虽然是受雇于他人,但相对无固定雇主类而言,他们与雇主之间签订了长期的劳资关系,在社会保障、工资待遇、劳动权益等方面享有优势。(5)上层,工商个体和创业者。包括个体私营户、自己是老板或者合伙人(不管有没有招雇员),相比于其他层级而言,他们由雇员转变为雇主、由被管理者转变为管理者,职业层性质发生了转变。

本文利用筛选得到的样本数据,从职业层层面考察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影响农民工晋级高层级工作岗位的决定因素,因此设定如下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

$$P(y=k/X)=\frac{e^{g_k(X)}}{1+\sum_{j=1}^{k}e^{g_j(X)}} \tag{1}$$

其中,y=1、2、3、4、5,分别表示最底层、底层、下层、中层、上层这5个职业层级;$g_k(X)$表示以最底层作为对照组,其他职业层与对照组相比后得到的Logistic变换模型,其表达式为:

$$g_k(X)=\log\frac{P(y=k/X)}{P(y=1/X)}=\beta_{k0}+\beta_{k1}X_1+\beta_{k2}X_2+\cdots+\beta_{kp}X_p \quad (2)$$

其中，β_{kp} 为估计系数，显然最底层的模型估计系数均为0，即 $g_1(X)=0$；X_p 为农民工职业层的影响因素变量集，根据相关研究和前文的描述分析，农民工职业层的影响因素变量选择如下：

（1）人口学特征。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决定着劳动者的劳动供给，说明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劳动能力，因此可以选取的变量有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一般而言，年长的农民工从事非农工作的能力相对较弱，且多分布在职业层级较低的工作岗位。与女性相比，男性农民工的劳动能力相对较强，并承担着家庭的经济重担，因此在较高职业层级就业的概率相对较高。较未婚而言，已婚农民工不但要赡养老人，还要抚养孩子，经济负担较大，其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意愿更加强烈，以期获取更高的收入。

（2）人力资本特征，包括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交往、积极情绪和普通话水平，这些因素与农民工能否顺利就业或进入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息息相关。按照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越低，则其在非农部门就业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工资收入也会偏低，从事较高层级职业的能力也越弱，停留在较低层级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越大。

（3）家庭经济状况及居住区域特征。相关研究证实，家庭经济条件和居住区域对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类型或者工作岗位具有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在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农民工，社会关系资源会比较多，获取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机会越大，且对低层级工作岗位的依赖性较低；居住在城镇或居住地越接近城镇的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的来源相对丰富，接受职业技能学习的机会较多，其进入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可能性更大。

进一步，本文分别按照代际、收入水平和居住区域对总体样本进行分组，考察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约束是否会因代际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和居住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探讨不同特征分组农民工晋级高层级工作岗位的约束差异。虽然农民工在选择职业时，不存在严格的次序问题，但其职业的层级具有高低之分，故运用Ordinal 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模型中的影响因素变量与式（2）中相同。

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统计描述情况见表3。

表3　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解释
职业层	3.55	1.32	1	5	1～5的多类、分序变量
性别	1.62	0.49	1	2	女=1；男=2
年龄	40.96	13.42	17	72	被调查者的实际年龄，连续变量
婚姻状况	1.82	0.38	1	2	未婚=1；已婚=2
健康状况	1.77	0.42	1	2	一般、差=1；好=2
受教育程度	2.18	1.04	1	5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专科=4；专科以上=5
社会交往	2.39	0.71	1	3	不密切=1；一般=2；密切=3
积极情绪	1.73	0.59	1	3	不积极=1；一般=2；积极=3
普通话水平	2.12	0.77	1	3	差=1；一般=2；好=3
家庭经济	1.74	0.57	1	3	低于平均=1；平均水平=2；高于平均=3
居住区域	2.45	1.46	1	5	农村=1；城镇=2～5

注：限于篇幅，只列出了总体样本的统计描述情况，分组样本的统计描述情况未报告；居住区域变量的具体解释为农村＝1、本市/县城的边缘地区＝2、本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3、本市/县城的中心地区＝4、本市/县城区以外的镇＝5。

五、农民工就业分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职业层的Multinomial Logistic估计结果分析

从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的估计结果（表4）看，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1.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呈现出明显的人口学特征差异

相比于女性，男性农民工从事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其处于下层、中层、上层工作岗位的概率分别是女性的3.39倍（$e^{1.220}$）、1.28倍（$e^{0.246}$）和1.52倍（$e^{0.419}$），这与中国农村家庭传统的“男为主，女为辅”的潜在经济承担分工意识有关。男性承担着较大的家庭经济责任，导致他们对高层级工作岗位的追求意愿更为强烈。从年龄分组变量的检验结果看，56岁以下的各年龄段农民工普遍具有非农就业需求，且年轻者处于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较之未婚者，已婚农民工处于底层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说明从事帮工类职业的多为已婚农民工。

2.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就业分化具有非常直观而显著的影响

表4的估计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处于较低层级的估计结果显著；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处于较高层级的估计结果显著。具体而言，初中组处于底层、下层工作岗位的概率分别是对照组的1.90倍（$e^{0.640}$）和1.68倍（$e^{0.519}$）；高中组和专科组从事上层工作岗位的概率分别是对照组的1.58倍（$e^{0.458}$）和1.26倍（$e^{0.229}$）；高中组较之对照组从事中层工作岗位的概率提高了55%（$e^{0.436}-1$）；而专科组、专科以上组将这一概率分别提高到了66%（$e^{0.508}-1$）和175%（$e^{1.010}-1$）。总体来看，受教育程度的不同造成农民工职业层的差异比较明显，是推动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因素。可能的解释：一是不同层级的职业类型对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要求存在差异，处于底层的帮工类职业对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不太明显，相比之下，中上层职业类型对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需求较高；二是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农民工的个人发展预期和就业信息搜寻能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可能更希望进入对未来发展更有利的工作岗位，且他们对劳动力市场信息掌握得更多、把握得更准确，进而能够提升他们与预期工作岗位成功匹配的几率。此外，健康状况变量在模型A1至A4中均显著，非农就业普遍对农民工的健康具有较大需求；社会交往、积极情绪和普通话水平在模型A2或模型A3中显著，说明社会交往越密切、积极情绪或普通话水平越好的农民工以被雇佣方式就业的概率越大。

3.家庭经济状况和居住区域特征对农民工就业分化具有一定的影响

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农民工进入上层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越大，这源于个体工商户或自主创业需要稳定的资本金支撑。居住区域特征方面，镇级地区变量（本市/县城的边缘地区、本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本市/县城区以外的镇）在模型A1或模型A4中显著，而本市/县城中心地区变量在模型A2至A4中均显著，说明居住在镇级地区的农民工从事无雇佣关系和自我雇佣类职业的可能性更大，而居住在市/县城中心地区的农民工越可能获得高层级工作岗位。

（二）农民工职业层的Ordinal Multinomial Logistic估计结果分析

为考察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影响因素是否会因代际、收入水平和居住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分别按照代际、收入水平和居住区域分割样本进行计量检验分析。第一，以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代际划分标准（1980年出生为界）将样本分割为新一代和老一代；第二，鉴于目前学术界尚没有农民工收入高低的统一划分标准，且本文所用数据来自CGSS2013年的调查数据，因此参照《2012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公布的2012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290元作为样本分割依据；第三，居住区域按照农民工被调查时的实际居住地划分为农村和城镇。计量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4　农民工职业层的Multinomial Logistic估计结果

	模型A1	模型A2	模型A3	模型A4
项目	底层	下层	中层	上层
截距	−5.740***（0.914）	−1.892***（0.422）	−1.363***（0.360）	−2.699***（0.415）
性别（女性）	0.178（0.286）	1.220***（0.190）	0.246*（0.152）	0.419**（0.165）
年龄（≥56岁）				
46～55岁	1.860***（0.668）	1.244***（0.366）	0.998***（0.286）	0.051（0.355）
36～45岁	1.866***（0.574）	1.336***（0.301）	1.120***（0.249）	1.213***（0.272）
26～35岁	1.928***（0.554）	2.008***（1.272）	1.550***（0.240）	1.793***（0.258）
≤25岁	1.361**（0.591）	1.700***（0.274）	1.245***（0.243）	1.333**（0.263）
婚姻状况（未婚）	1.347**（0.541）	0.250（0.254）	0.020（0.201）	0.244（0.237）
健康状况（一般及以下）	0.656*（0.358）	0.312*（0.194）	0.637***（0.170）	0.413**（0.183）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0.640*（0.352）	0.519**（0.202）	−0.040（0.186）	0.057（0.197）
高中	0.291（0.462）	1.052***（0.331）	0.436**（0.219）	0.458*（0.274）
专科	−0.936（0.648）	1.674***（0.454）	0.508**（0.212）	0.229*（0.121）
专科以上	−8.994（1.086）	−1.856（1.343）	1.010*（0.532）	0.654（0.695）
社会交往（不密切）				
一般	0.234（0.451）	0.018（0.248）	0.340*（0.121）	0.156（0.245）
密切	0.285（0.438）	−0.089（0.240）	0.137***（0.011）	0.419*（0.234）
积极情绪（不积极）				
一般	0.236（0.301）	0.119（0.188）	0.004（0.158）	−0.002（0.172）
积极	0.248（0.581）	0.240**（0.127）	0.542*（0.299）	0.264（0.303）
普通话水平（差）				
一般	−0.062（0.379）	−0.172（0.209）	0.202（0.190）	−0.123（0.203）
好	0.255（0.399）	0.264（0.241）	0.594***（0.208）	0.436**（0.224）
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				
平均水平	−0.375（0.297）	−0.229（0.183）	−0.109（0.158）	0.388**（0.176）
高于平均水平	0.287（0.553）	−0.412（0.421）	−0.111（0.126）	0.932***（0.336）
居住区域（农村）				
本市/县城的边缘地区	0.105（0.519）	0.174（0.284）	0.275（0.252）	0.723***（0.266）
本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	0.930**（0.434）	0.006（0.302）	0.353（0.256）	0.512**（0.258）
本市/县城的中心地区	0.333（0.358）	0.439***（0.121）	0.296**（0.148）	0.355*（0.197）
本市/县城区以外的镇	1.470***（0.438）	−0.310（0.368）	0.315（0.303）	1.261***（0.295）
−2Loglikelihood	4916.543			
Chi-square	649.022			
Cox&Snell	0.269			
N	2067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变量列的括号内容为对照组，参数估计列的括号内容为标准误。

表5 农民工职业层的Ordinal Multinomial Logistic估计结果

项目	新一代：80后和90后	老一代：70后及之前	月平均收入≤2290元	月平均收入>2290元	居住区域：农村	居住区域：城镇
	模型B1	模型B2	模型B3	模型B4	模型B5	模型B6
性别	0.352**	-0.030	-0.180	0.162	-0.071	0.337***
	（0.149）	（0.104）	（0.135）	（0.118）	（0.134）	（0.110）
年龄	0.093***	-0.048***	-0.016***	-0.011*	-0.010**	-0.026***
	（0.021）	（0.005）	（0.005）	（0.006）	（0.005）	（0.005）
婚姻状况	0.282*	0.453**	0.458***	0.466***	0.721***	0.400***
	（0.153）	（0.189）	（0.171）	（0.150）	（0.176）	（0.141）
健康状况	0.001	0.440***	0.330**	0.122	0.375***	0.209
	（0.216）	（0.117）	（0.148）	（0.145）	（0.153）	（0.141）
受教育程度	-0.005	0.257***	0.009	0.092*	0.174***	0.022
	（0.071）	（0.058）	（0.080）	（0.054）	（0.073）	（0.056）
社会交往	0.202*	0.120*	0.101	0.086	0.047	0.122
	（0.111）	（0.068）	（0.087）	（0.078）	（0.088）	（0.077）
积极情绪	0.267**	-0.054	0.002	0.029	-0.053	0.051
	（0.129）	（0.087）	（0.117）	（0.092）	（0.111）	（0.094）
普通话	0.165**	0.105**	-0.058	0.070	0.111	-0.063
	（0.086）	（0.046）	（0.091）	（0.076）	（0.086）	（0.081）
家庭经济	0.412***	0.288***	0.304*	0.303***	0.274**	0.397***
	（0.134）	（0.088）	（0.117）	（0.096）	（0.112）	（0.099）
居住区域	0.222***	0.135***	0.066	0.190***		
	（0.053）	（0.034）	（0.045）	（0.038）		
/cut1	1.347	1.435	-0.090	0.162	0.962	-0.357
/cut2	1.674	1.659	0.087	0.545	1.140	-0.019
/cut3	2.322	2.642	0.925	1.514	2.211	0.701
/cut4	4.622	4.224	2.520	3.476	3.967	2.551
Chi^2	38.21***	108.95***	44.07***	59.17***	61.40***	71.49***
伪R^2	0.021	0.027	0.019	0.018	0.024	0.022
N	672	1395	805	1262	887	1180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内容为标准误。

由表5的计量检验结果可知：

第一，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经济变量在模型B1～B6中均通过了至少10%的显著性检验，对农民工的职业层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已婚农民工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更大，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农民工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越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入分组和居住区域分组中，年龄变量与农民工职业层之间均呈现显著的负向关联关系，但在代际分组中，农民工的年龄与其职业层并不是一直保持着相同性质的符号关系，说明农民工的年龄与其职业层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年龄的适当增长会增加农民工晋级高职业层的可能，但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长，农民工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反而会减小。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初期，随着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提升他们的职业层晋级能力，但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健康水平下降，且相对于其他职业群体而言，农民工不具备人力资本优势，其职业层的持续晋级受到约束，最终可能返乡就业甚至返农；另一方面即使部分农民工以自我雇佣的状态就业，但多是比较弱小的工商个体户，不稳

定因素较多，且极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

第二，按照代际分组，无论是新一代还是老一代，婚姻状况、社会交往、普通话水平、家庭经济状况和居住区域均对农民工职业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变量在模型B1和模型B2中均显著，但影响方向相反，说明在新一代农民工中，年长者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而在老一代农民工中，年轻者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变量在模型B2中均正向显著，但在模型B1中不显著，说明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健康状况越好或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其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越大，但对于新一代农民工而言，职业层不受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显著约束；积极情绪变量在模型B1中正向显著，但在模型B2中不显著，说明对于新一代农民工，情绪越积极者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越大，但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积极情绪因素对其职业层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按照收入水平分组，健康状况变量在模型B3中正向显著，但在模型B4中不显著，说明对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农民工而言，健康状况越好则其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越大，但对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农民工，其职业层不受健康水平的显著约束；受教育程度变量在模型B3中不显著，但在模型B4中正向显著，说明对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会显著提升其在高职业层就业的概率，但对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其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越大；居住区域变量在模型B3中不显著，但在模型B4中正向显著，说明对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农民工，若居住在城镇则其晋级高职业层的可能性更大。

第四，按照居住区域分组，性别变量在模型B5中不显著，但在模型B6中正向显著，说明对于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男性发生职业层晋级的可能性比女性更大；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变量均在模型B5中正向显著，但在模型B6中不显著，说明对于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好或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其晋级高职业层的可能性越大，但对于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其职业层的提升更可能是受健康水平和学历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六、农民工职业层晋级能力的提升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职业层的层面考察了农民工的就业分化。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工就业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将近60%的农民工从事着雇员类工作，25.06%的农民工以自我雇佣的形式就业，但依然有15.53%的农民工处于暂时性失业、务农状态。此外，处于不同就业状态的农民工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新一代、高学历、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更倾向于从事具有长期固定雇佣关系的工作。第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提升农民工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是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决定因素。此外，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呈现出明显的人口学特征差异，同时家庭经济状况和居住区域特征也会对农民工的就业分化产生影响。第三，影响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因素在不同代际、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居住区域的群体中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提升老一代、高收入和居住在城镇农民工的职业层晋级概率。

在经济转型增长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农民工就业管理及其职业层晋级能力的提升具有丰富的政策启示意义。

第一，高度重视农民工（特别是暂时失业、返农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根据本文的分析，处于暂时性失业、返农状态的农民工占比达15.53%。构成这一比例的可能原因：一是经济增速转型导致了部分农民工返乡、返农待业；二是农民工处于工作变换的职业空白期。因此建议相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一是抓紧建立农民工（特别是返乡农民工）就业和失业的登记、监测机制，为解决返乡待业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提供及时、合理的政策引导依据；二是提高农民工利用报刊、电视、职业中介和网络等渠道获取就业信息的可能性，进而缩短农民工工作变换的职业空白期。

第二，注重增加农民工的受教育机会。本文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具有非常直观而显著的作用，是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决定因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提升农民工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建议相关教育主管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如扩大职业高中、成人教育的办学规模，增加函授、夜校等比较灵活的教学方式，开发相关高等院校的农民工继续教育功能，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受教育可能。

第三，加大对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帮扶。根据本文的分析，25.06%的农民工以自我雇佣的状态就业，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动农民工的职业层晋级，这构成了创业农民工的规模以及农民工自主创业的趋势。因此建议相关政策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如在工商注册、创业资金、基础设施设备、租金、税收等方面为创业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便利、扶持和优惠。

第四，进行适当差异化的政策引导，提高针对性和吸引力。具备不同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其职业层晋级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引导职业层合理流动上，应当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内部异质性。如对于老一代、高收入和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注重引导其参加更多学历教育；但对于新一代、低收入和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工，则可以引导其参加职业培训和考取相关资格证书，且注重增加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改善其在工作岗位和城市融入中的积极情绪表现。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272-323.
[2]CAI F, DEWEN W.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growth[M].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5.
[3]王伟同.中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研究——兼论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J].财贸经济,2012 (11):14-20.
[4]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 3-42.
[5]陈宗胜,黎德福.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的再解释[J].经济研究,2004 (11):16-27.
[6]厉以宁.发展优势的创造[J].当代财经,2013 (1):5-7.
[7]陈浩,陈雪春,谢勇.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职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 (6):72-79.
[8]谢勇,周润希.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7,38(2):92-101.
[9]王志浩.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区域选择:模型与实证[J].统计与决策,2007 (8):122-124.
[10]张文洲.新时期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新特征调查[J].经济纵横,2016 (1):49-54.
[11]KONDO A, OU D.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The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of rural and urban migrants in China[Z]. ISER Discussion Paper, 2010.
[12]孙小龙,王丽明,贾伟.工作环境、工作强度与农民工工作流动[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6,21(8):176-188.
[13]范婧.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问题,2014 (9):82-87.
[14]石智雷,薛文玲.中国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回流决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3):143-152.
[15]汪润泉,刘一伟.住房公积金能留住进城流动人口吗?——基于户籍差异视角的比较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7 (1):22-34.
[16]温兴祥.户籍获取、工资增长与农民工的经济同化[J].经济评论,2017 (1):135-147.
[17]田北海,雷华,佘洪毅,等.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孰重孰轻: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再探讨——基于地位结构观与网络结构观的综合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13 (1):34-47.
[18]田艳平.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81-88.
[19]BASKER E. Education, job search and migration[R]. University of Missouri-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03.
[20]ARIGA K, OHTAKE F, SASAKI M, et al. Wage growth through job hopping in China [Z]. IZA Discussion Paper,

2012.
[21]王建.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何种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正规就业?[J].中国农村观察,2017 (1):113-126,143-144.
[22]纪韶,刘德建.农民工职业层次分化与就业身份选择——基于2013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J].调研世界,2015 (11):32-35.
[23]谭银清,王钊,陈益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影响研究[J].调研世界,2015 (9):57-60.
[24]刘晴.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化[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3,27(4):60-64.
[25]陈书伟.人力资本与外出农民工职业选择——基于河南省三县市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15 (6):18-24.
[26]杨晓军,陈浩.农民工就业的职业选择、工资差异与人力资本约束[J].改革,2008 (5):95-100.
[27]韩雪,张广胜.工资机制、劳资关系与进城务工人口职业分层[J].人口与经济,2015 (5):72-81.
[28]王轶,王琦.新常态背景下特大城市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J].当代财经,2016 (5):3-11.
[29]盛子桐,施俊琦.感知求职进展对求职行为的影响: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8(6):873-878.
[30]PIOTROWSKI M, TONG Y.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return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Thailand[J]. Population, 2010, 65(2): 333-348.
[31]JUNGE V, DIEZ J, SCHTZL L.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nal return migration in Thailand and Vietnam[J]. World Development, 2015, 71(7): 94-106.
[32]HIRVONEN K, LILLEOR H. Going back home: Internal return migration in rural Tanzania[J]. World Development, 2015, 70(6): 186-202.
[33]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98-125.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UYANG Bo-qiang[1], ZHANG Guang-sheng[2]
(1.*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66*, China;*
2.*Business School,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data of China in 2013, this paper uses logistic model to study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differentiation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The study finds that, nearly 60% migrant workers are employees; 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ho are temporarily unemployed or carry out farming accounts for 15.53%; the percentage of self-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is 25.06%; male migrant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take higher level jobs; education level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for migrant workers to take high-level jobs, and it'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upgrading migrant workers' occupation level; migrant workers, with better economic conditions, or living in urban centers have a greater probability of engaging in higher-level jobs; the age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occupation level present an inverted "U" shape relationship; factors affecting the upgrading of migrant workers' occupation level are different in groups of inter-generations, income levels, and living area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differentiation; occupational level classificati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